

# 以套话推诿责任 也是官僚作风

36名官员,吃了3626元,人均100元,这在“公务”宴上可以说是一顿“简餐”了。就是这一顿“简餐”,广西龙胜县委书记唐天生被免职;县长王少荣等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 县委书记 因公款“简餐”丢官 冤吗

一班“县大爷”,栽在这样的吃喝上,估计几个人都不会服气。局外也会有人觉得处理过重。比起经常被媒体曝光的“天价吃喝”、“豪华盛宴”,龙胜县的这一餐饭确实小巫见大巫。何况,为下属接风送行,人之常情,党政一把手怎么着也得设个宴吧。照这样处罚,有多少官员不得落马?

这么说,是不是县委书记唐天生被处罚得冤了?是不是对龙胜县的这顿“接风宴”有点小题大做了?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这个疙瘩不解开,相信不少地方干部心里堵得慌。要知道,像这样的吃吃喝喝,不说天天有,起码三六九,若是见一顿“杀”一顿,肯定“官不聊生”啊。

我们要说,严肃处理龙胜县的“接风宴”,是当地纪检部门的正确做法,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唐突。

其一,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地方文件三令五申之下,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风起云涌之际,在“四风”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时,龙胜县以县委书记、县长为首,顶风而上,公款吃喝,而且在记者采访时还狂妄地呵斥说“你尽管报”,其权力的张狂,对上级精神的公然违抗,对公共财政肆意挥霍的恶习,暴露无遗。这样的案例还搞下不为例,心慈手软,如何对公众和舆论交代?如何告诫世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

其二,龙胜是个“徒步百年石板路”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没告别落后贫穷。“接风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花费不多,但公款如私家钱袋一样子取予夺,其性质没什么区别。今天,为一个干部送行可以海吃一顿,明天,为一个同僚接风可以大摆筵席,后天,可以为张三李四的诞辰、擢升、康复、孩子上大学,父母做丧事而公款设宴,皆大欢喜。可这都是民生亟须的公共资金啊,县“衙门”凭什么就能大手大脚地乱花?这样的“舌尖上腐败”吃出了多少群众苦楚?

其三,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告诉我们,一些基层官员的职务消费惊人,简直是“挥金如土”。大大小小的正职副职每年要花掉几十万到数百万的公款,吃是公家的,住是公家的,用车是公家的,请客送礼是公家的,就连玩夜总会、搞三陪都巧立名目公款报销,简直是把纳税人的钱不当钱。这种堂而皇之的腐败因为“不落腰包”,过去,大多是“自己理直气壮,制度无可奈何”。如今,整风目标明确,所有公款私用、公款滥用“揩公家油”的行为,都将露头就打。在此风头下,重典是必需的。

第四,四桌饭只吃了3000多元,究竟有几人相信。记者看见书记县长杯盏交错,那酒钱烟钱有没有算在内?我们知道,现在有不少党政机关办公室内藏烟囤酒,赴宴时这些都属于自备,不计入餐费,以降低吃喝标准。一瓶酒就是一两千,一顿下来,开销几何,明眼人都清楚得很。在餐费数字上做手脚,放大“冤情”,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由此,龙胜一顿“公款简餐”撞掉一个大官帽,一点也不冤。看似“蠢免撞在枪口上”,实乃“张弓以待贪吃货”,活该丢官。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西 风

本月底开始,国内各大高校逐渐开始开学报到,又一拨90后揣着、背着、穿着崭新的各类“新式装备”入学。除去学费的各类消费以一万元作为起步价,家长直呼“上不起”。王先生的女儿9月报道,“还没去学校,购买数码产品的花费就已经将近两万”。在私人做统计工作的张女士称开学至少两万花销,相当于夫妻俩4个月的工资。(8月18日《沈阳晚报》)

## “高价”入学装备 不是最好的准备

iphone5手机、笔记本电脑、形形色色的数码产品,旅行箱、配眼镜、隐形眼镜及隐形眼镜药水,化妆品,生活日用品、床上用品……这些“新式装备”一应俱全。校门还没跨一步,几万元就已经挪出去了,这还不包括必要的学费、交通费和生活费,难怪有家长感叹:“上个大学简直如同烧钱,和我们那个拿着行李卷就去报到的年代没法比了!”

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来说,升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90后又大多是家里唯一的“宝贝”,奖励也好,宠爱也罢,家长自然要倾尽全力满足孩子的愿望。但是,细细思量一下,冷静思考片刻,我们不禁会问:对于即将迈入人生中至关重要阶段的孩子而言,这些“高价”入学装备真的就是必需、必要的装备吗?

其实,手机不必非要iphone,数码产品也不是必需品,甚至于对刚刚进入大学,重点在于打牢基础知识的大一新生来说,电脑其实也没有太大用处,至于名牌化妆品、高档旅行箱之类则更是可有可无。也就是说,这些家长们大呼“上不起”的所谓入学装备,大部分并非开学的必需品,更非入学的最好准备。那么,是什么导致孩子尚未入学就已经“高消费”?谁又是“高价”入学的幕后推手呢?

究其原因,盲目攀比心理是诱因。其实上看,“高价”入学似乎是孩子表现出来的问题,其实背后离不开家长的教育与引导。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很多孩子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下,吃喝不愁衣食无忧,久而久之,他们以为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家长“不能输在面子上”的思维定式和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传递到了下一代身上,而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和奋斗的精神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递。所以,孩子只会关注自己有没有,而忽略了获得方式。

探其本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是本源。这种社会风气不应助长,更不应在孩子身上体现。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高价”入学装备,无非是数码产品,可以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效率,却也可以使孩子玩物丧志,成为“游戏”人生的工具。

就业形势愈发严峻的现实面前,“高价”入学装备显然不是最好的准备。大学四年的黄金光阴当如何度过,都有哪些规划,孩子在心理上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才是家长和孩子值得关注的“装备”。  
宋 华

近日,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时,“护照检查40人花了一个半小时,过安检25人排队等了大半个钟头”,整个转机时间等了两个小时,差点误机。于是他向好友发了封电邮吐槽说“官僚作风,甚于全世界”,并称“以后能不经广州,就绝对不经”。

丘成桐吐槽的“官僚作风”,主要是指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丘先生是数学家,自然对数据特别敏感,才会留意到护照检查“由三分钟到五分钟一个人”的具体操作时间。丘先生又是个经常转机旅行的人,对这“效率”是高低还是有发言权的,他说“我去过世界各地那么多著名的机场,很少有哪个机场护照检查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这是他个人对机场效率的

评判。

估计以丘先生的胸襟与涵养,即便是对朋友私下吐槽,本意也不是想指责某个具体工作人员,而是批评机场的整体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但出人意料的是,机场方面在得知此事后的回应,明显“化大为小”了。机场称“获悉后十分重视,但由于无法取得丘成桐的航班号,很难查证”,“如某些员工的行为属于慵懒散的,一旦查证,机场会坚决处理”。“十分重视”、“坚决处理”,虽然耳熟,毕竟也不是无名之辈能轻易得到的待遇,只是这样应对,似乎是把丘先生看小了,好像他要报复一下某个机场工作人员似的。且不说机场要取得丘成桐的航班号易如反掌,要知晓是哪几个工作人员服务的也有证可查,这闭

着眼睛说空话假话,本是官僚作风的突出表现;更该关注的是,“十分重视”、“坚决处理”这套话的背后,多的是凌人的官气,缺的是反省的自觉,多的是推诿的伎俩,少的是责任的担当。这比丘先生指责的不讲效率的“官僚作风”更官僚作风。

出了事推出一线工作人员甚或临时工背黑锅,而不从整个管理机制着眼反思、改过,这不正是“高高在上”、“遇事不負責任”的官僚作风的最本质表现吗?态度决定高度,这高度不是高地位的高,而是高品质的高。有人曾用泥菩萨来给官僚主义者画像,说其“久坐不动,十分无用”,用这话来形容自己不担责任,只知打推脱、推诿太极手的管理作风,确实很恰当。  
洪信良

## 局长体验“蒸笼车”后



今夏高温天,市民乘坐没有空调的公交车可谓备受煎熬。8月13日下午,苏州市交通局局长邵建林就亲身体验了一把“蒸笼车”——没有空调的108路,体验之后,邵建林局长承诺将尽快将非空调车换掉。据了解,苏州目前共有非空调车725辆,按目标要求,到2014年夏季,苏州所有非空调公交车将全部“下岗”,取而代之的是舒适凉爽的空调公交车。  
(8月15日《扬子晚报》)  
罗 琪 图

点评: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邵局长亲身体验“蒸笼车”,并当即承诺将尽快将非空调的公交车换掉,百姓拍手称快。  
天天坐在空调房里如何能体验底层劳动人民的大汗淋漓,如何能感受普通百姓

的拥挤闷热,扎到群众中去感受“蒸汽”方能“出汗排毒”。  
欢迎更多的领导干部“体验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父母官们真正体会了民众的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时,百姓犯难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  
朱 巍

## 退休高管辞去独董 不能是凭自觉

最近,贵州省长石秀诗、山东省长韩寓群和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崔俊慧“18天年薪”受聘出任中国重汽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一事有最新进展。据报道,14日,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石秀诗先生、韩寓群先生、崔俊慧先生提出,不受聘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务,本公司尊重并同意三位先生的意见,并不再履行其他聘任程序”。

高管退出独董,这并非第一次。早在2011年,由于中纪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了“禁令”,就掀起一阵高校领导请辞独董职务的风潮。虽然主要是教育界直属高校领导,但其在行政序列中与高官并无太大区别,也可以视为是高官。这次的三位高官请辞,并无具体规则约束,与舆论的压力应该有直接关系,只能暂且视为民意之胜。

对于这种独董高官化、权力化的表现,一般认为是对于正常资本市场的伤害,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囿于目前官员的监督现状和退休后权力仍难以消减的格局,规范高官的退休行为,更应该上升到制度的高度。  
现阶段公务员热的出现,一般被解读为福利优渥,却很少从公务员身份的溢价效应来衡量。官员退休后仍可以仗着前领导的身位另一个领域“呼风唤雨”,这无疑也是很多人期待的“公务员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官员退休后的“繁荣”,能够得到制度化的遏制,公务员职业也就可能更接近于“去魅”。

从这个意义上,防止高官向资本市场的延伸,不能靠个体自觉。完善独董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须防范权力的溢出效应,减少相关政策的弹性,才能真正遏制“退休后”的权力。这对于政府放权,乃至市场规则和法治化的推动,才有真正的净化作用。  
朱昌俊

## 民企“代管”公车只是天真闹剧

日前,一家民企向云南省统计局递交材料,申请代管公车,并承诺:愿交保证金100万元,保证做到“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公车私驾、公车私用”,而且“满意再付费”。

民企提出代管以解决问题。而把这认为是政府后勤保障社会化不过是一种误解。由民企代管公车,与由社会提供公车服务,完全不同——后者才称得上是政府后勤保障社会化。

投标程序都省了,直接给了那些与公车单位领导眉来眼去的企业。凭什么相信企业不会跟权力项目和凭什么政府部门把公车管理的项目交给你来做而不交给我来做?依靠招投标来杜绝权钱交易吗?政府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纠缠不清,比比皆是,在改革名义下,赢者通吃,谁能保证这不是一次利益输送的绝佳良机?

这家民企又说,“满意再付费”,究竟是由谁来说满意?当然不可能民企自己,那么,是民企服务的单位还是人民?

如果是公车单位,若民企代管真能做到严禁公车私用,这样不难想象,公车单位的“满意”从何谈起?若是以人民“满意”与否作为标准,公车改革何需20年困局难破,更轮不到需要由

民企提出代管以解决问题。而把这认为是政府后勤保障社会化不过是一种误解。由民企代管公车,与由社会提供公车服务,完全不同——后者才称得上是政府后勤保障社会化。

从大方向上,要解决公车私用无解的困境,需要改变的是目前权力内部监督“双手互搏”的局面。但是,民企要干纪委的事,这其中的边界需要厘清——监督公车是否私用是公共性的行为,而民企作为公车管理者,则是商业性的行为,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内在紧张能否消除,如何消除?一个以追求利润为天职的小小民企,如何能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也就是说,公车是否私用的认定权、解释权依然唯一掌握在权力手上时,民企即便作为公车管理单位被引入,也根本无法打破内部监督缺乏制衡的局面,他要么成为权力的一场盛宴,要么注定是一场天真的闹剧。  
苏少鑫

据中国之声报道,工信部编制完成《推动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并上报国务院等待批复。方案提出,力争五年后,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企业总数整合到50家左右,前10家国内品牌企业行业集中度超过80%。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朱宏任表示,企业兼并重组势在必行。

## 奶粉业兼并重组 政府不该过度干预

前段时间,蒙牛并购雅士利打响了国产奶粉行业兼并重组的第一枪。如果,工信部的方案获得通过,可以预见的是,国内奶粉行业格局将迎来一轮大洗牌。

国产奶粉行业兼并重组有其必要性。通过兼并重组可以加强资源整合,提高经营效益,做大企业也有助于有关标准的推行和管理的规范,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要搞好国产奶粉行业,推动行业的兼并重组,还应注意不要进行行政干预和拉郎配,充分尊重市场。兼并重组应该是市场自发行为,奶粉行业也不例外。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自由组合,如果企业认为没有必要,也有权不兼并重组。拉郎配难以获得幸福,强扭的瓜也不甜。各级政府部门不可越位干预重组个案。

推动奶粉行业的兼并重组,需要吸取当年山西煤炭重组以及钢铁行业重组的教训。浙江民间资本被迫退出山西煤炭行业,原来的钢铁大王杜双华被迫出售日照钢铁,都是当年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

因为,兼并重组一旦成为一定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必然会降低被兼并方的资产市场价格,伤害市场公平。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行政主导的行业兼并,往往易于形成新一轮国进民退的风潮。奶粉行业若兼并重组,是否又是几大国有奶业巨头的饕餮盛宴?这也非常令人担心。

奶粉行业有其特殊性。当年三聚氰胺事件,保持了清白之身的三元恰恰市场规模不大。无论是三聚氰胺事件,还是恒天然事件,都说明奶粉行业的安全风险极高,自有的奶源越多,生产基地离奶源越近,安全才越有保障。各级政府部门也应该允许和鼓励,一个乳企踏踏实实做好产品,保证安全,而其在做大规模上并无太多野心。

对很多本土乳企来说,安全和规模在短期内是一个矛盾,这需要时间,需要在加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同时,靠市场自己去解决。而且兼并重组,不可能不面临经营整合以及企业文化融合等问题,同样要冒很高的安全风险。

李克强总理上任伊始就说,要简政放权,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那只手换成市场的手。由此来看,奶粉行业兼并重组也不能违背这样的改革方向。

洋奶粉价格畸高、安全丑闻不断,这需要我们尽快搞好国产奶粉。搞好国产奶粉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摆脱政府过度干预的路径依赖。评价国产奶粉行业兼并重组,不能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同时还应该看看是否有利于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否真正令公众得益。  
于德清

8月16日,A股投资者见证了中国证券史上的罕见一幕。11点刚过,沪指突然出现大幅拉升,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权重股集体出现涨停,大盘一分钟内涨幅超过5%,最高涨幅5.62%。

## 惊天乌龙指 是怎么敲乱股市的

一时间,“蓝筹股股份将转为优先股不再流通”、“IPO重启会只对持有沪深300蓝筹股的机构配售”等传闻充斥市场。午后,光大证券停牌并承认,其策略投资部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的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同时申请交易作废,随即遭到上交所否决。这一事件导致几个小时内,期指近60亿空头被屠杀,听信消息入市的投资者同样损失惨重。

“乌龙指”不是第一次在股市出现,但产生如此巨大的杠杆效应,在中国股市还是第一次。显然,在上海证监局和上交所的正式结论出来后,应当启动对光大证券的问责。无论是监管部门对其扰乱市场行为实施惩罚,还是受损投资者索赔,都理所应当。然而,我们突然发现,对于此类“乌龙指”事件,可以凭借的维权依据似乎少得可怜;对于今后是否还会发生类似事件,心里也没底。

比如,一指下去而掀起如此波澜,凭光大证券一方力无法做到,是大量机构乃至个人投资者使用的程式交易系统参与所致。而程式交易系统闹祸早有先例,市场人士应该对2010年5月6日美国纽交所“乌龙指”导致道琼斯指数骤然出现千点暴跌的事件记忆犹新。在电脑程式交易占比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防范类似风险似乎并未引起重视。如果能借鉴接入交易所的机构席位强化交易系统安全,是否可以减少损失?如果出现“乌龙指”后,有某种“断电机制”弥补错误,市场是否就不会如此动荡?如果知道真相的投资者能够当天卖出股票,而非受T+1制度所限眼看着受损,是否可能减少损失?

这么多如果,都只是如果。一个黑色幽默式的场景是,在市场知道“乌龙指”真相后,投资者也没有补救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因为一个低级错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冲击还不仅于此。比如,市场可能短期内出现起伏平淡的情况,股指期货投资的风险水平无疑也会升高——今后,他们必须将此类不可控的偶发事件列入风险当中。

于是,对“乌龙指”事件的定义都成了一个问。如何确定市场被涉及范围?如何确定受损情况?哪些人是该赔偿的哪些不是?光大证券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怎么定,投资者可能都不满意。

“乌龙指”事件,表面上暴露的是光大证券的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是证券交易系统和监管制度的问题。因此,在监管部门调查的同时,相关软硬件建设也不能等着,而应该行动起来。别以为“乌龙指”只是个例,而与自身无关。  
徐立凡